

个人禀赋、制度环境与创业决策： 一个实证研究

杨其静，王宇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研究发现，返乡者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可支配财富、教育程度等个人禀赋因素对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同时，政府的质量对返乡者的创业倾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上述因素的变化可在边际上大幅度影响返乡者选择自雇型创业的倾向，但对于其规模型创业倾向的影响要弱得多。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为了激励创业活动，政府应首先减少腐败和提高办事效率，并充分认识到，自雇型创业而非规模型创业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对象。

[关键词] 返乡者；创业决策；个人禀赋；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6X (2010) 01—0068—06

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完善和拓展了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因此，对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的研究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回乡创业作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输出的派生现象，对缓解三农问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文关注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个人禀赋因素、制度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返乡者的创业倾向？虽然一些学者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2]}，但多以案例分析为主。笔者于2006年12

月对安徽F县展开了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得了比较丰富的返乡者关于创业决策的相关数据，从而使得笔者有机会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

一、可能影响创业决策的因素

返乡者的创业活动本质上属于一种企业家活动。然而，关于企业家的本质，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因为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不同的理解。

[收稿日期] 2009—10—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民营企业的融资与治理”

[作者简介] 杨其静（1972—），男，重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王宇锋（1985—），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笔者已作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比如, 由于对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强调, 奈特认为企业家的第一要素是敢于承担风险并且必须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3] 对此, 熊彼特坚决反对, 他强调企业家的基本功能在于发现具有市场获利机会的创新并领导实施该创新, 而不是利用财产来承担风险。^[4] 沿着奥地利学派关注市场过程的传统, 柯兹纳更一般地认为, 企业家最基本的特性是对变化着的环境或被普通人忽视了的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 并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企业家才能。^[5]

笔者认为, 如果将创业理解为特定的企业家发现市场获利机会并将其转化为一个企业的过程, 那么最好综合上述观点, 即现实的企业家应具备如下优秀的企业家人力资本: 对市场机会的认知能力, 在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而且, 由于信息悖论使得那些发现了市场机会的企业家必须亲自组建企业来实现这一机会, 因此“领导管理能力”也应该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货币资本作为企业家获得其他要素的桥梁, 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4] 一般认为, 个人可支配的财富有利于缓解创业过程中的流动性资产约束, 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发生。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那些家庭财富和收入更多的人从做雇员转为做自雇的比例更大。^[6]

除了个人财富外, 社会资本也有助于企业家低成本地获得创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7] 此外, 整个社会, 尤其是政府对企业家创业的友善和产权保护程度会对企业家决策产生重大影响。^[8]

综上所述, 返乡者所拥有的企业家型人力资本, 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等禀赋条件, 以及制度环境等都会影响其创业决策。不过, 哪些因素才是影响打工回乡者创业决策的主要因素呢? 或者说, 他们中的哪些人更可能实施创业呢?

二、相关调查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 关于调查数据来源的说明

2006年12月, 在安徽省F县政府和当地的几

名大学村官的协助下, 针对打工返乡者, 笔者进行了为期20天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调查数据。

(1) 受访对象为外出3个月以上并在3年内不太可能再次外出打工的返乡者。受访对象包括创业者和未创业者两大类, 并进一步根据创业初期的年营业额是否超过100万人民币为标准, 将创业者进一步区分为规模型和自雇型创业者。与几乎所有的文献一样, 笔者以受访者在调查时的就业状态来判断其创业决策。

(2) 笔者采访了该县几乎所有的规模创业者, 并通过偶遇抽样方式对自雇型和未创业者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01份, 收回有效问卷94份, 有效率为93%; 去掉年龄小于18岁的10个样本和大于等于60岁的1个样本, 总共有83个有效样本, 其中回乡创业者49名(规模型创业者19名, 自雇型创业者30名), 未创业者34名。

由于样本完全取自一个县也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地域间的创业文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区位等因素的差异对返乡者创业决策的影响。

(二) 对变量选择与测度的说明

笔者在问卷调查设计了81个问题。根据本研究的需要, 笔者选择了那些反映返乡者创业决策、企业家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打工经历、制度环境以及一些控制变量的问题(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关于受访者的企业家型人力资本, 在问卷中对其中的每一个维度(机会认知能力、风险态度和管理能力)都涉及多个问题, 以便获取更全面和准确的信息。随后, 分别对各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以便降维为单一特征值变量, 并被用于后文的计量分析中。第二, 由于中国高中以上的在校教育, 除了一般的人力资本培育功能外, 本身还有很强的筛选功能, 因此在考虑了在校教育时间的基础上对教育程度做了表1中的赋值。第三, 笔者还询问了受访者的家庭离县城的距离, 但未发现该因素对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 故将之省去。

表 1 主要涉及解释变量的问题描述、测度和描述统计

变量		符号	问题简单描述	测度
财富	家庭财富	W	外出前家庭的相对富裕程度?	$W = 1, 2, \dots, 10$, 其中 $W = 1$ 为最穷, $W = 10$ 为最富
	务工收入	R	所有拿回家的钱?	$\ln R$
企业家人力资本	机会认知能力	$Alert$	(1)常想赚钱机会吗?	- 2= 从不在意, - 1= 不太在意, 0= 一般, 1= 比较在意, 2= 非常在意
			(2)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如何?	- 2= 很弱, - 1= 较弱, 0= 一般, 1= 较强, 2= 很强
	风险偏好	$Risk$	(1)是否比较“胆大”?	- 2= 很胆小, - 1= 比较胆小, 0= 一般, 1= 比较大, 2= 很胆大
			(2)是否比较能闯?	- 2= 不能闯; 1= 不太能闯; 0= 一般, 1= 较能闯, 2= 很能闯
			(3)您更愿意选择哪种情况?	0= 风险较小但收入较低, 1= 风险较大但收入较高
	管理协调能力	$Mana$	(1)管理能力如何?	- 2= 很差, 1= 较差, 0= 一般, 1= 较好, 2= 很好
			(2)交际能力如何?	- 2= 很差, - 1= 比较差, 0= 一般, 1= 较好, 2= 很好
外出工作性质 ^①		Job	工作性质是?	1= 体力工作, 2= 技术工作, 3= 管理, 4= 销售, 5= 自己做买卖, 办厂
打工年数		$Outy$	—	年
社会资本		Soc	有亲属做生意\当官?	0= 没有, 1= 有但较小, 2= 有且较大
制度环境评价		$Safe$	(1)治安环境?	- 2= 很不好, - 1= 不好, 0= 一般, 1= 较好, 2= 很好
		Gov	(2)办企业需要与政府搞关系吗?	- 2= 非常重要, - 1= 比较重要, 0= 不重要, 1= 完全不需要
控制变量	教育水平	Edu	—	0= 文盲, 1= 小学, 1.5= 初中, 2= 高中, 2.5= 中专, 3= 大专, 4= 本科及以上
	性别	Gen	—	0= 女; 1= 男
	年龄	Age	—	年

（三）变量间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提出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笔者首先对相关变量做了共线性分析，并由此发现有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受访者的市场机会认知能力、风险态度和管理能力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大，尤其前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0.73 且非常显著。这意味着，不应简单地将这三者视为刻画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相互独立特征。第二，受访者的外出工作性质与其市场机会认知能力、风险态度和管理能力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0.58 和 0.46，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相关。因此，不应将那些反映外出工作经历的变量直接作为创业决策的解

释变量。第三，受访者的外出工作收入与三个维度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几乎都在 0.45 以上且显著。这意味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产物。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笔者对外出务工收入 ($\ln R$) 做回归分析，并由此获得残值 R_i ——可被大致理解为受访者打工期间源于非自身禀赋因素的可支配收入。

综合上述因素，笔者首先给出了两个用于检验的计量模型，以便重点揭示受访者不同维度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模型 1: $\ln R_i = f(W_i, Alert_i, Mana_i, Outy_i, Soc_i, Edu_i, Gen_i, Age_i) + R_i$;
 $p(E_i | x_i) = p(E_i | W_i, R_i Alert_i, Mana_i, Soc_i,$

① 由于在后面的计量中不会使用该变量，因此到底赋值多大才是合理的问题并不重要。

$Govi, Saf ei, Edu i, Age i, Gen i)$

模型 2: $\ln Ri = f(Wi, Risk i, Manai, Outy i, Soci, Edu i, Gen i, Age i) + R_B;$

$p(E_i | x_i) = p(E_i | Wi, R_B, Risk i, Manai, Soci, Gov i, Saf ei, Edu i, Age i, Gen i)$

式中, $p(E_i | x_i)$ 表示给定受访者禀赋和制度环境下发生或希望发生(规模)创业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揭示不同的制度环境因素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去掉“政府关系”(Govi)而仅仅以“社会治安”(Saf ei)作为刻画制度环境的变量,因此给出模型3。

模型 3: $p(E_i | x_i) = p(E_i | Wi, R_B, Alert i, Manai, Soci, Saf ei, Edu i, Age i, Gen i)$

三、关于创业倾向的计量分析结果及其含义

由于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受访者:若当老板和打工收入差不多时,您倾向于选择哪种?几乎所有的已创业样本选择了“自己当老板”;而且,未创业的样本中也有59%选择了“自己当老板”,26%选择了“无所谓”,而仅有15%选择了“给别人打工”。可见,在返乡者心中,创业是优于继续务农或者打工的选择。因此,本文选用了STATA.10的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从表2可见,似然率和拟 R^2 等指标显示3个计量模型的总体估计结果良好。为解释各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受访者的创业决策,表3考察了各个解释变量对各种创业决策发生概率的边际影响。结合表2和表3,本文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1) 虽然受访者的家庭财富和社会资本对创业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外出工作收入却对创业决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不过,这个可支配收入对于受访者是否选择自雇型创业还是规模创业的影响力却存在很大差异。以模型1的实证结果为例, R 增加1,受访者选择不创业的概率减少0.232,选择自雇型创业的概率增加0.182,而选择规模创业的概率只增加0.05。

(2) 企业家型人力资本的三个维度对受访者的创业决策都有非常显著和重大的正面影响。不过,机会认知能力的作用最为重要,其次是风险态度,

而管理能力处于一种辅助性地位。观察表2可知,在模型1中市场机会认知能力对受访者创业倾向的回归系数为2.975且非常显著,但管理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只是在模型2中管理能力的回归系数(1.203)才变得很显著。有意思的是,市场机会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模型1)与风险态度和管理能力的回归系数之和(2.78)(模型2)很接近。而且,这种关系在边际效应上也存在。

表2 关于创业决策的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结果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庭财富	0.088 (0.551)	0.101 (0.467)	0.050 (0.731)
残值 (R_i)	1.165*** (0.005)	1.281*** (0.001)	0.877** (0.017)
机会认知能力	2.975*** (0.000)	—	2.678*** (0.000)
风险态度	—	1.577*** (0.001)	—
管理能力	0.538 (0.322)	1.203** (0.021)	0.369 (0.441)
社会资本	0.19 (0.675)	0.198 (0.660)	-0.321 (0.422)
政府质量	1.38** (0.003)	1.445*** (0.002)	—
社会治安	0.391 (0.433)	0.179 (0.707)	0.996** (0.024)
教育	1.824*** (0.008)	1.817*** (0.005)	1.717*** (0.009)
年龄	0.158*** (0.001)	0.171*** (0.000)	0.119*** (0.003)
性别	-0.357 (0.610)	-0.003 (0.996)	-0.582 (0.377)
Log likelihood	-43.135	-47.826	-48.690
LR chi2	91.51	82.12	80.39
Prob>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514 7	0.462 0	0.452 2
样本数	83		

说明:***, ** 和*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为 $p > |Z|$ 。

表 3 创业决策的边际分析结果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E= 0	E= 1	E= 2	E= 0	E= 1	E= 2	E= 0	E= 1	E= 2
家庭财富	- 0 017 (0 550)	0 014 (0 555)	0 004 (0 555)	- 0 022 (0 466)	0 017 (0 477)	0 005 (0 468)	- 0 010 (0 731)	0 006 (0 733)	0 003 (0 731)
残值 (R_i)	- 0 232** (0 011)	0 182** (0 034)	0 050* (0 057)	- 0 284*** (0 001)	0 215*** (0 013)	0 069** (0 023)	- 0 171** (0 025)	0 110* (0 077)	0 060* (0 051)
机会认知能力	- 0 592** (0 000)	0 465*** (0 004)	0 127** (0 028)	—	—	—	- 0 521*** (0 000)	0 336** (0 015)	0 185* (0 007)
风险态度	—	—	—	- 0 350*** (0 002)	0 265** (0 015)	0 085** (0 025)	—	—	—
管理能力	- 0 107 (0 329)	0 084 (0 343)	0 023 (0 360)	- 0 267** (0 024)	0 202** (0 050)	0 065* (0 065)	- 0 072 (0 442)	0 046 (0 453)	0 025 (0 459)
社会资本	- 0 038 (0 678)	0 030 (0 681)	0 008 (0 678)	- 0 044 (0 661)	0 033 (0 664)	0 011 (0 662)	0 062 (0 422)	- 0 040 (0 439)	- 0 022 (0 431)
政府关系	- 0 275** (0 007)	0 216** (0 031)	0 059** (0 042)	- 0 321*** (0 004)	0 243** (0 025)	0 078** (0 019)	—	—	—
社会治安	- 0 078 (0 433)	0 061 (0 441)	0 017 (0 455)	- 0 040 (0 707)	0 030 (0 708)	0 010 (0 710)	- 0 194** (0 034)	0 125* (0 093)	0 069* (0 054)
教育	- 0 363** (0 013)	0 285** (0 033)	0 078* (0 077)	- 0 403*** (0 007)	0 305** (0 025)	0 098** (0 046)	- 0 334** (0 012)	0 215* (0 052)	0 118* (0 048)
年龄	- 0 031*** (0 002)	0 025** (0 016)	0 007** (0 042)	- 0 038*** (0 000)	0 029*** (0 010)	0 009** (0 016)	- 0 023*** (0 006)	0 015** (0 043)	0 008** (0 030)
性别#	0 071 (0 611)	- 0 055 (0 612)	- 0 015 (0 624)	0 001 (0 996)	- 0 001 (0 996)	0 000 (0 996)	0 112 (0 382)	- 0 072 (0 393)	- 0 041 (0 412)

说明:***, ** 和*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为 $p > |Z|$; # 表示 dy/dx 是对哑变量从 0 到 1 变化的边际值。

(3) 制度环境因素, 尤其是政府的廉洁和效率会对受访者的创业倾向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质量和社会治安对创业决策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1. 38 (模型 1) 和 0. 996 (模型 3) 且其相关性显著。不过, 若政府关系和社会治安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时, 后者对受访者的创业 (边际) 倾向的影响就变得不显著了 (见表 3 模型 1)。这意味着, 阻碍受访者创业热情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就是政府腐败和官僚作风。然而, 政府质量和社会治安对于受访者的规模型创业倾向的边际影响差不多,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模创业者更容易与政府建立起特殊的政治关联而得到特殊的政治庇护。

(4) 返乡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创业决策具有非常显著且重大的影响, 哪怕它甚至对外出工作收入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以模型 1 的实证结果为例, 教育程度关于创业倾向的回归系数仅仅次于机会认知能力, 高达 1. 824; 而且, 教育程度的值每增加 1, 受访者选择不创业的概率会下降 0. 363, 选择自雇型创业和规模型创业的概率分别增加 0. 216 和 0. 078。上述现象意味着, 虽然教育程度对返乡者

是否选择创业具有重要影响, 但这并非来自于教育对受访者外出工作收入的影响。

(5)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个结论是, 虽然上述因素对受访者的创业选择有重大影响, 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减少那些返乡者选择不创业的倾向, 并增加选择自雇型创业的倾向, 而对于增进其选择规模型创业的倾向, 其效果要弱得多。

四、总结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的实证研究表明,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可能比较接近现实, 即市场机会认知能力, 而非风险态度, 才是企业家最根本的人力资本特征; 而且, 创业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自身市场机会的认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判断, 以及由此作出的理性选择, 并非来自单纯的冒险精神。这意味着, 仅仅将“风险态度”作为研究返乡者创业决策的主要解释变量可能很不充分^[9]。

此外, 笔者还得到了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第一, 财富约束是阻碍创业活动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因此即便不考虑外出工作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政府也有必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以便增进打工者未来创业的概率。第二,与返乡者创业所面临的财富约束相比,制度环境因素,尤其是政府的友善程度对返乡者的创业倾向具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如果真正希望鼓励返乡者创业,与其给予创业者各种形式的物质帮助,还不如政府提高自身的廉洁程度和办事效率更有意义。第三,虽然受教育程度未必会影响打工收入,

但它却会严重地影响将来返乡之后的创业倾向,因此国家仍然应该鼓励和帮助农村子女获得尽可能多的在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第四,虽然可支配收入、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因素的改善可大幅度增加返乡者选择自雇型创业的倾向,但对于增进规模型创业倾向的效果却要弱得多。这意味着,在制定扶持返乡者创业的政策时,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自雇型创业而非规模型创业才是政府最有效的帮助对象。

参考文献

- [1] 刘光明,宋洪远. 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 特征、动因及其影响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2, (3).
- [2] 林裴. 对 90 年代回流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04, (2).
- [3] F.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M]. New York: A. M. Kelley, 1964.
- [4]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5]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
- [6] D. S. Evans, L. S. Leighton 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3).
- [7] B. Uzzi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64 (4).
- [8] T. Frye, A. Shleifer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2).
- [9] 陈波. 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9, (3).

(责任编辑: 杨万东)

INDIVIDUAL ENDOWMENT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AN EMPIRICAL STUDY

YANG Qijing, WANG Yu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ur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of the returned migrants and their individual endowments such as the 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 disposable wealth and education. We also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 quality might also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preference. In addition, although all the above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self-employment preference, the effects are relative small on the scaled entrepreneurial marginal preference. All the abov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corruption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nduc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inly support self-employment but not scale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returned migrants;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individual endowment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